「中國問題」與社會理論的牽纏

加力服

現代中國知識人以西方的知識工具捍衞華夏之「道」。梁漱溟、毛澤東、牟宗三的「主義」和實踐尤其鼓勵了以西方之「道」超越西方這樣一種擔華夏之「道」的方略。建構中國的社會理論,靠支配中國思想界一百年的民族性比較的辯護心態,肯定會落空。

自百年前「中國問題」發生以來,漢語思想就沒有能擺脱它的糾纏,但不同 的歷史時期,漢語思想把握「中國問題」的知識學工具以及心理動力是不同的。

當今漢語學界魚貫而出的「社會科學本土化」論、「後現代一後殖民話語」、「國學新潮」、「制度創新」論等等,無不顯出就「中國問題」舊問題的新提法或舊提法的新表達。這表明,漢語思想在「中國問題」上飄浮了一百年,仍在如何使這一問題轉化為何種理論形態上游離不定。在我看來,這是由於一種可稱之為「現代士大夫精神」的心理動力情結的纏礙。

何謂「中國問題」?簡扼地說,它指晚清士大夫們看到的中國所遇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」: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人心秩序的確當性均需要重新論證。這種論證需求是由西方逼出來的。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次來看「中國問題」的具體定位:在歷史事功層面,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單位如何富強,在國際(國族)間的不平等競爭中取得強勢地位:在生活秩序的價值理念層面,中國傳統的價值理念與西方理念的衝突如何協調,民族性的價值意義理念和相應的知識形態如何辯護:在個體安身立命的意義層面,如何維護中國的傳統終極信念的有效性,設想其解放性力量不僅對中國有效,也對西方有效。這樣看來,「中國問題」可謂現代意義上的「道」崩,士大夫能不臨危擔「道」?

當中國面臨「列國競爭」的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格局,「中國問題」自然就出現了,從世界範圍來看,也有「德國問題」和「俄國問題」,但中國知識人被「中國問題」糾纏,不僅是命運,亦是使命。中國的「道」面臨被西方政治一文化毀滅的危難,現代士大夫的擔「道」使命是如何抗衡西方。那末,百年來中國知識人在思考「中國問題」時採用過哪些知識學工具,構築了甚麼樣的理論,以此擔華夏之「道」呢?

晚清知識人的主要擔「道」識資源是傳統經學,現代今古文經學論爭

(康、章)的內在動力是「中國問題」,清末民初引入西學和種種「主義」話語,更換了擔「道」的知識資源,儘管這些資源和「主義」種類不一,基本上可以分疏出幾種不同的知識學路向:文化哲學的路向(梁漱溟、朱謙之、張君勱),實證科學的路向(胡適),人類學一社會學的路向(吳文藻、潘光旦、費孝通),社會主義的民族化政治路向,參照西歐哲學構架重設的心學路向(熊十力、牟宗三);參照西方史學和經驗科學原則重設的史學傳統路向(顧頡剛、陳寅恪、錢穆)。概而言之,以西方的知識工具擔華夏之「道」,是現代中國知識人的共通點。

70年代末以來,漢語思想學術在經過幾十年的政治非常時期後,對「中國問題」的把握在知識資源和分析工具的擴建方面,有了進一步的積累。對「中國問題」的理解,仍然受擔「道」心態支配,似乎分析工具在變換,心態一直沒有改變。

現代擔「道」心態在民族性比較中積聚了種種情結。「中國問題」的不同提 法,受到這些情結的約束。

現代士大夫式的擔「道」精神基於捍衞華夏之「道」。梁漱溟、毛澤東、牟宗 三的「主義」和實踐尤其鼓勵了這樣一種擔「道」方略:以其人之「道」還治其人之 「身」,以西方之「道」超越西方:它基於無比強烈的華夏民族驕傲遭到傷害時產 生的怨恨情感。當代士大夫精神要繼承和捍衞的,正是這種基於怨恨的以西方 之「道」鄙棄或超越西方的情結。

民族性比較中積聚的種種情結,一再推延了「中國問題」向現代性問題的轉化,使得中國的社會理論遲遲難以建立起來,按舍勒(Max Scheler)一哈貝馬斯(Jürgen Habermas)的三種知識類型的劃分,前述「中國問題」的三個層面對應於三種知識的旨趣和利益取向;在社會理論中,這三種知識類型融構成不同的社會理論模式。當韋伯(Max Weber)、特洛爾奇 (Ernst Troeltsch)、舍勒、哈貝馬斯、盧曼 (Niklas Luhmann)等在考慮「德國問題」時,其社會理論的建構融構了不同的知識類型的旨趣和利益,使「德國問題」切實轉化為現代性問題。這是德國知識人的擔「道」與中國知識人擔「道」的表層差異;深層差異是,不存在借他者之「道」還治他者之「身」的士大夫精神。「道」不同不相為謀,但現代士大夫精神不能撤開西方的知識理論,於是,民族性原則與科學原則之間的緊張,無法消除或轉化。

漢語思想在把握「中國問題」時,尚未能有效地融構不同層面的旨趣和知識學,因而也就不能切實地把「中國問題」轉化為現代性問題。建構中國的社會理論,靠支配中國思想界一百年的民族性比較的辯護心態(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」),肯定會落空。

「主義」論爭在當今中國又有復興之迹,思想衝突和競爭對學術思想的發展 是良性的,但「主義」論爭若無社會理論為基層結構,反而受士大夫精神(無論 如何要與西方不同)的驅使,歷史大概要循環了。

至於文人們的士大夫擔「道」話語中表露出的更為抒情的怨恨情狀,就不赘述了。

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